

法国里昂：见证了周恩来邓小平等革命先驱的求索与抗争

## 追忆留法青年的“红色足迹”

## 追访欧洲红色足迹

新华社法国里昂5月17日电 (记者徐永春、唐霁)法国东南部城市里昂与中国有着不解之缘,这里曾是古丝绸之路在西欧的终点之一。百年前,里昂成为中国留法勤工俭学学生在法国的主要聚集地之一,见证了爱国青年的求索与抗争。在那些峥嵘岁月里,周恩来、邓小平、陈毅、蔡和森、赵世炎等革命先驱都曾在这里留下他们的“红色足迹”。

在中国共产党建党百年之际,新华社记者前往里昂,访友人、寻遗迹、忆历史。法国里昂新中法大学协会副主席、法中友协联合会主席阿兰·拉巴长期关注中国留法勤工俭学史,将那段岁月向记者娓娓道来。

留法中国青年在里昂的“红色足迹”与里昂中法大学密切相关。创建于1921年7月的里昂中法大学,是中国近代在海外设立的唯一一所大学类机构,建校经费来自捐款以及庚子赔款余额。

跨越百年岁月,里昂中法大学旧址依然静静矗立,石堡城门上用汉字和法文镌刻的“中法大学”见证着历史沧桑。阿兰·拉巴告诉记者,学校创办初衷是为留法中国学生创造稳定的学习环境。当时,许多留法勤工俭学的中国学生经济陷入窘境,学业难以为继,里昂中法大学创办的消息让他们重新燃起求学希望。

然而,北洋政府却声称里昂中法大学不接纳留法勤工俭学学生,仅招收从国内来的学生。这让留法勤工俭学学生的求学梦再次破灭,也成为“争回里昂中法大学”运动的导火索。作为时任天津《益世报》派驻法国的特约通讯员,周恩来撰文疾呼:“途穷了,终须改换方向。势单了,力薄了,更需联合起来。”1921年9月,蔡和森、赵世炎、陈毅等上百名勤工俭学学生代表,为争取“生存权、求学权”,以“入校”名义进入里昂中法大学,但遭到当地警察拘捕。阿兰·拉巴分析运动起因时说,五



拼版照片:法国里昂中法大学旧址(左图,摄于2011年4月26日)和旅法中国学生在里昂中法大学内合影的资料照片(右图)。

四运动影响深远,激发了留法学子的爱国热情和斗志。“此外,他们中的一些人在法国接触到了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,决心争取自身权利。”

当年,中国学生被临时拘押于蒙吕克军事监狱,后被法国当局强行遣送回国。如今,这座监狱早已停用,但仍基本保持当年格局,主体建筑是一座灰色三层楼房。楼内的监舍狭小阴暗,只有接近天花板处的一个小窗户能透进一丝亮光。

阿兰·拉巴评论道:“争回里昂中法大学”运动是一次具有合理诉求的正义斗争,学生们为争取公平的学习条件而抗争。”运动虽然失败,但一些青年学生的革命意志更加坚定,马克思主义信仰更加成熟。

谈及周恩来和邓小平在里昂的经历,阿兰·拉巴说,周恩来和邓小平留法期间曾多次来到里昂,与当地勤工俭学学生颇有交集。“周恩来对欧洲社会现状、政治体系和共产主义运动进行了深入调研和思考。他在留法青年中具有很强的政治感召力。”他介绍说:“当年,在里昂中法大学附近的一家小餐馆里,勤工俭学学生经常聚集在周恩来周围,讨论时事和政治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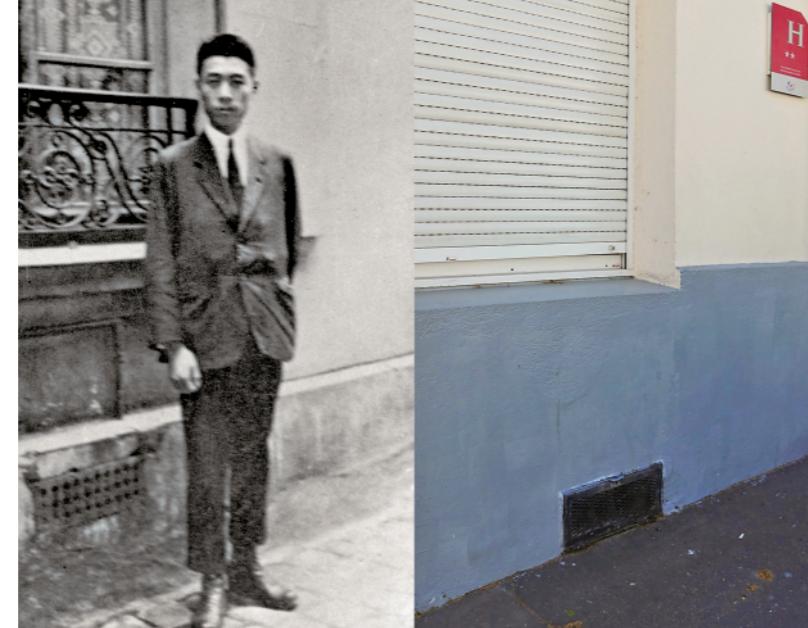
资料记载,1925年上半年,邓小平也来到里昂,负责领导里昂地区的党团工作和华工运动。阿兰·拉巴说,邓小平在留法期间积极参加周恩来、陈毅、赵世炎等人组织的政治和革命活动,里昂是他们的重要活动地点之一。

阿兰·拉巴认为,留法勤工俭学学生在里昂的政治活动和斗争虽然曲折,却提高了青年学生的政治觉悟,一大批青年领袖从运动中脱颖而出,崭露头角。周恩来等随后创立了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,为配合中国国内革命斗争展开了一系列活动;当时被迫回国的蔡和森等人则积极投身到国内革命的洪流之中。

1934年10月,董振堂率部参加长征,红5军团担任最艰苦的“后卫”任务,为保障中央红军主力北上立下了赫赫战功,红5军团

跨越山海,初心不改。1921年7月23日,在大多数留法勤工俭学学生曾经登船启程的地方——上海,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正式开幕。同年10月,在“押解”着中国留学生的归国邮轮上,蔡和森将一百多名归国学生比作“一百单八将”,坚信“回国后,一定能闹出个赤色的新世界来!”。

## 在法兰西探寻民族复兴梦的中国青年



拼版照片:周恩来旅法期间在旅馆前留影的资料照片(左)和拍照地点现状(拍摄于2021年4月25日)。1920年,22岁的周恩来从上海启程赴法。他在1922年至1924年期间曾住在这家小旅馆。

新华社记者高静摄

## 成长

记者驱车来到位于蒙达尔纪城郊的哈金森橡胶厂,这里还保留着当年厂房的外观。从1920年至1927年,数百名中国青年曾在这个工厂工作过,其中包括邓小平。

蒙达尔纪森林中学学生莱亚·佩雷拉和同学们不久前观看了有关中国青年旅法勤工俭学的纪录片。佩雷拉告诉记者,诸多细节令她印象深刻:18岁的邓小平和工友住在简陋工棚里,每天工作10小时,周六还要工作半天,但学徒期时薪仅有一法郎……

长期研究蒙达尔纪的法国历史学者让·路易·里佐接受记者采访时指出,法国20世纪初处在激烈的时代变革和政治斗争中,各地罢工浪潮汹涌,这极大影响了中国勤

工俭学学生。“他们生活条件艰苦,工资很低,了解法国工人阶级的困苦,在政治上变得非常敏锐。他们很快从工作实践上升到对政治的分析,被马克思主义深深吸引。”

这些进步青年,在繁忙工作间隙交流思想、分享各自对国家未来的思考,他们中的一些人自此走上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的道路。1922年6月,在巴黎西郊的布洛涅森林空地上,周恩来、赵世炎等18名青年成立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。不久,邓小平也加入这一组织。

## 斗争

巴黎十三区戈德弗鲁瓦街有家不起眼的“海王星旅馆”,这里见证了青年周恩来旅法期间的革命生活。2001年,旅法多年的李建乐、杨艳春夫妇克服重重困难,买下这

走进位于河北省新河县的董振堂事迹陈列馆,一幅幅展板、一张张照片、一件件文物诉说着董振堂将军和革命先辈不畏牺牲、与敌殊死搏斗的战争场景。

在红5军团军旗前,不少参观者驻足良久。陈列馆馆长宋秀英深情讲述了军旗背后的故事,人们思绪又回到了革命先辈与敌人肉搏拼杀的战争年代。

董振堂,1895年出生于河北新河县一个农民家庭。少年聪颖,1917年考入北京清河陆军中学,1923年毕业于颇负盛名的保定陆军军官学校。毕业后投身于冯玉祥的西北军,因战功显赫,由排长逐级升至师长。1930年,中原大战后被国民革命军收编,任26路军第73旅旅长。

九一八事变后,他反对蒋介石“攘外必先安内”的政策,思想日益倾向革命。随后,与赵博生、季振同等率领第26路军1.7万余官兵在宁都起义,宣布加入红军,在中国革命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。

董振堂是红军牺牲的最高级别将领之一。党中央在陕西宝塔山下举行了追悼会,在追悼会上毛泽东评价他说:“路遥知马力,董振堂是坚决革命的同志。”宋秀英介绍,陈列馆请专业的团队制定了完整的研学课程体系,让学生走出课堂,走进纪念馆,体验战时生活,珍惜来之不易的生活。



董振堂像 新华社发

因此荣膺“铁流后卫”的光荣称号。

1935年6月,第5军团改称第5军,董振堂任军长。1936年10月红军三大主力在会宁会师后,红5军被编入西路军,向宁夏、甘肃、新疆方向进发。1937年1月12日,董振堂率部在甘肃高台县城与六七倍于己的敌人浴血苦战,战至最后一人一弹,于20日壮烈牺牲,时年42岁。

董振堂是红军牺牲的最高级别将领之一。党中央在陕西宝塔山下举行了追悼会,在追悼会上毛泽东评价他说:“路遥知马力,董振堂是坚决革命的同志。”

宋秀英介绍,陈列馆请专业的团队制定了完整的研学课程体系,让学生走出课堂,走进纪念馆,体验战时生活,珍惜来之不易的生活。

新河地近九河下梢,饱受盐碱化、沙化之困,贫困发生率曾高达49.78%。新河儿女脚踏实地加油干,2019年全县实现脱贫摘帽,如今正大踏步地走在小康路上。

(记者白明山)

新华社石家庄5月17日电

## 数风流人物

河南省周口市扶沟县吉鸿昌将军纪念馆前,民族英雄吉鸿昌的铜像高大伟岸,庄严肃穆。这里是扶沟县的地标建筑之一,近些年,不少游客冒雨来到吉鸿昌将军铜像前敬献花圈、默哀致敬,缅怀革命先烈。

吉鸿昌,1895年生,河南扶沟人。1913年入冯玉祥部。1921年冯部扩编为第十一师,吉鸿昌升任营长。1925年10月,吉鸿昌升任绥远督署直辖骑兵团团长兼任警务处处长,不久后又被推荐任三十六旅旅长。

1926年9月,在中国共产党人刘伯坚等人的帮助下,冯玉祥部在绥远省五原誓师,响应北伐战争,吉鸿昌率三十六旅千里驰援被围困数月之久的西安,使西安城转危为安。

1927年三十六旅扩编为十九师,吉鸿昌升任师长,率部进驻潼关。这一时期,他一方面大力支持共产党人在部队开展政治工作,一方面同著名共产党人刘伯坚、宣侠父、魏野畴等亲密往来,向他们请教革命道理。

1927年7月蒋、冯徐州会议后,第二集团军内部进行清党“送客”,大批共产党人被“礼送”离队,而在十九师,吉鸿昌不仅没有搞“送客”,还暗中保护了一批共产党员。1931年夏,因特务告发,吉鸿昌的潢川起义计划夭折。1931年8月,蒋介石解除吉鸿昌的兵权,强令他“出国考察”。

吉鸿昌此次出洋,时值“九一八”事变爆发。吉鸿昌环游了欧美等十余国,沿途向各地侨胞积极宣传抗日。

一次,他要往国内邮寄衣物,美国邮局的职员竟说“不知道中国”,吉鸿昌非常气愤,跟着监视他的国民党特务却劝告他说:“你若说日本人,便可受到礼遇。”他怒斥道:“你觉得中国人丢脸,我却认为当中国人无上光荣!”

回到旅馆,他当即找来一块小木牌,写上“我是中国人”5个字,下面还用英文作了翻译。以后,每逢赴宴或出入于大庭广众之处,他都把这块木牌佩戴胸前。

1932年2月28日,吉鸿昌从国外回到上海。他立即找到中共上海地下党组织,商谈抗日救国活动大计。同年秋天,他在北平加入中国共产党。

1932年10月9日,冯玉祥决心与中共合作,共同抗日,吉鸿昌则在天津为抗日武装发动察哈尔抗战计划而四处奔走。他毁家纾难,变卖家产六万元购买枪械。1933年3月下旬,他按照党的指示,急赴张家口,协助冯玉祥



吉鸿昌像 新华社发

揭旗抗日。

1933年5月26日,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宣告成立,吉鸿昌任第二军军长。6月20日,冯玉祥任命吉鸿昌为北路军前敌总指挥。他率同盟军主力分3路北进,在一个月内,抗日同盟军接连收复察北四县,使日军遭到九一八事变以来的第一次沉重打击,震动中外。

1934年5月,吉鸿昌参与组织了“中国反法西斯大同盟”,他被推选为主任委员。这时吉鸿昌在天津法租界霞飞路40号的家,成了党组织的地下联络站。在楼上一角,他还设立了简易印刷所,印刷反法西斯大同盟的机关刊物——《民族战旗》和党的秘密文件。

吉鸿昌的活动引起了敌人的密切注意。蒋介石严令北平军分会不惜一切手段逮捕暗杀吉鸿昌。11月9日晚,吉鸿昌被捕。

在国民党北平军分会举行的所谓军法会审时,他义正词严,变敌人的法庭为讲坛,历数国民党反动派祸国殃民、残内媚外的罪恶,庄严宣称:

“我是中国共产党党员,能够为党的事业,为全人类的解放事业而奋斗,这已是我毕生最大光荣。”

临刑前,他以树枝作笔,以大地为纸,写下了正气浩然的就义诗:“恨不抗日死,留作今日羞。国破尚如此,我何惜此头!”1934年11月24日,吉鸿昌英勇就义,年仅39岁。

2009年,吉鸿昌被评选为“100名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”。

吉鸿昌的女儿吉瑞芝说:“父亲已经离开87年了,但我一直觉得他就在我的身边,他的精神一直激励着我。父亲是我们党的骄傲,民族的骄傲,他的英雄事迹,已化作不朽的民族精神和不竭的精神财富,他身上体现的崇高精神和浩然正气,必将激励一代又一代人为党和人民的事业不懈努力。”

(记者翟濯)新华社郑州5月17日电